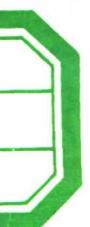




第二辑

河北革命回忆录



河北人民出版社

河北革命回忆录

第二辑

冀东革命回忆录专辑

冀东革命回忆录编辑组 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石家庄

河北革命回忆录

第二辑

冀东革命回忆录专辑

冀东革命回忆录编辑组 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6 1/4印张 155.000字 印数：1—3,700 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86·516 定价：0.60元

前　　言

自古燕赵多征战，周知关山育英雄。回望半个世纪以来无产阶级的革命征程，在我们河北的土地上，有数不清叱咤风云的革命英雄；有说不尽可歌可泣的革命史话；有写不完惊天动地的光辉业绩。对于这些，需要回忆——记载——保存——流传，颂扬革命前辈，教育子孙后代。从这点出发，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河北革命回忆录》丛书。

当年，曾长期领导、指挥晋察冀广大军民对敌斗争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同志，对革命回忆录的出版工作十分重视和关心，并欣然挥笔为我们写了书题：“河北革命回忆录”。这对我们的出版工作是极大的关怀、鼓舞和推动。

在我们编的这套丛书中，所收文稿的原则要求是：从时间上，写抗战以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事迹；从范围上，写在河北省境内的革命实践活动；从内容上，忠于历史，事迹真实。

在硝烟弥漫、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里，同志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记载领导的、战友的、自己的战斗生活。全国解放后，我们党很重视革命回忆录的整理和出版工作。一九五八年河北省委曾发出了有关撰写革命回忆录的指示，随之有不少同志写了回忆文章。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把在民主革命时期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革命同志打成“走资派”、“反革命”，把写革命回忆录，诬蔑为“涂脂抹粉”、“树碑立

传”，迫使写回忆录的同志投笔十年之久，在这段文化史上回忆录成了空白。

粉碎“四人帮”以后，历史面目得到恢复，神州百业获得重生。在这个历史春天里，我们殷切希望曾在河北战斗过的同志以对革命史料“抢救”的姿态，以对革命后代负责的精神，重新执笔，忆写当年。用我党的光荣传统激励人们在新的长征中，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目 录

英勇的斗争 伟大的胜利(代序)

.....	李运昌 李楚离 张明远 李中权	(1)
忆父亲李大钊	李星华(24)
大钊同志送我上军校	李运昌(32)
冀东早期的农民运动	张明远(37)
——兼忆江浩、于方舟、杨春林三烈士		
回忆冀东抗日大暴动	李运昌(55)
忆抗战初期的几位战友	李运昌(76)
抗日志士杨十三	连以农(93)
难忘的岁月 珍贵的友谊	张 珍(98)
国际主义战士周文彬	金信正 李春光(104)
永生的战士	李一夫(114)
滦县三烈士	张振宇(122)
“盘山乡长”李子光	李运昌 李楚离(134)
从愤世到暴动	高敬之(138)
从拼命到革命	曹致福(156)
出路	张振宇(163)
党指引我战斗成长	周治国(171)
在敌人心脏里战斗	朱欣陶(184)
父亲牺牲前后	高玉书(190)

英勇的斗争 伟大的胜利（代序）

——忆冀东人民的革命斗争

李运昌 李楚离 张明远 李中权

冀东人民的革命斗争同全国各地一样，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发展和取得胜利的。这本来无须特别提出来。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原冀东地区我们的党组织竟却被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诬蔑为“叛徒党”、“国共合作的党”，冀东被诬蔑为“黑冀东”；冀东的许多好干部也被诬陷成“叛徒”、“特务”、“国民党”、“走资派”，并受到了残酷的打击和迫害。其中，有不少当年从枪林弹雨中冲杀出来的好同志，在林彪、“四人帮”的棍棒下含冤死去。连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和其他革命先驱者也不能幸免：被骂成是“变节分子”或“错误路线的殉葬品”！林彪、“四人帮”一伙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竟到了如此卑鄙无耻的地步！所以，我们今天有必要对冀东党组织和人民的长期斗争做一简略回顾，以澄清史实，总结经验，缅怀先烈，教育后代。

冀东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区。早在一九一九年，这里就留下了革命先驱者的足迹。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之一李大钊同志、中国早期革命家江浩同志都出生在这里，并在这里活动过。一九一九年李大钊同志亲自参加并领导的“五四”运动，曾在这里引起过巨大的反响。当时，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和以邓培为代表的唐山工人阶级都曾动员起来，勇敢地同反动的北洋军阀卖国政府进行斗争，声援北京的爱国学生运动。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李大钊同志立即着手在北

方建党。在唐山首先吸收邓培等八名革命者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吸收邓培等同志入党。一九二二年夏天，中共唐山市委正式成立，邓培同志任书记。

一九二二年九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王烬美同志到京奉铁路（即北宁路）山海关铁工厂（桥梁厂的前身）工作，组织工人运动。接着，又派邓中夏同志到唐山指导工人的革命斗争。从此，京奉路、山铁、开滦矿、秦皇岛港等处都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斗争。由于工人们不堪忍受中外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所以，一经组织起来，就显示出巨大的力量，给了反动当局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

一九二四年，李大钊同志派共产党员回冀东发展农村党的组织。这一年的八月，冀东农村的第一个党支部在李大钊同志的故乡——乐亭县诞生了。一九二五年夏，江浩同志带着京、津等地的一批进步学生，回到他的故乡——玉田县，利用全县教师暑期讲习会，传播革命思想。一九二六年，中共北方区（即北方局）农民委员会又派张明远、杨春林等同志回冀东活动。在北方区的直接领导下，玉田、遵化、丰润、迁安等县也相继建立了党的组织。这些地方的党组织一经建立，就积极开展农民运动。那时，灾难深重的冀东人民身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加上军阀混战，倍遭蹂躏，本来已经苦不堪言，反动政府又变本加厉，增加了各种名目的税捐，特别是强制推行“旗地变民”，逼着农民拿出很多的钱买回本来属于自己耕种的“旗地”。这样一来，闹得民怨沸腾，无数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玉田的党组织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及时地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反“旗地变民”斗争，并获得了胜利。其后，遵化、迁安等县也发动了类似的斗争，同样获得了胜利。在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中，先后建立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和京东各级农民协会，积极领导农民抗捐、抗税等斗争。这一系列的斗争，沉重打击了反动政府的统治，显示出党的领导作用和人民群众的威力，

为尔后发动武装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这一期间，李大钊同志不仅以极大的努力发展北方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而且对制定和实现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一九二四年，他代表我党同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扩大左派力量，打击右派势力，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这样，就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大大推动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促进了“五卅”运动及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并于一九二六年开始了北伐战争。但是，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右派开始抬头，到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并与国际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相勾结，在全国范围内镇压革命，制造白色恐怖。李大钊同志就是在这一年的四月二十八日被杀害的，同时在京遇难的还有另外十九位革命志士。那天下午两点，大钊同志第一个走上刑台，慷慨激昂地作了他平生最后一次演说。他指出：“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并且高呼三声“共产党万岁！”他就这样在敌人的绞刑架上从容就义了。

李大钊同志的牺牲和成千上万共产党人的惨遭杀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一九二七年七月以汪精卫为头子的武汉政府叛变革命后，革命虽转入低潮，但斗争并未就此终止。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发动了南昌起义，开创了在我党独立领导下工农武装革命的新纪元。同年八月七日在瞿秋白同志主持下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就是在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上，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进一步明确了土地革命和开展武装斗争，以武装的

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在南方，毛泽东等同志领导了声势浩大的秋收暴动。在北方，王荷波同志（北方局书记）也亲临玉田，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指示县委要领导玉田农民举行武装暴动。

玉田暴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举行，参加暴动的农民万余人。暴动开始以后，很快就攻克玉田县城，解除了城内反动武装，并准备成立革命的县政府。但这时，京东特委书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叶善枝慌忙从遵化赶来。他一来到就指责玉田县委“胡来”、“蛮干”，下令解散农民自卫队，强令农民自卫队撤出县城。

针对这一情况，中共顺直省委作出了成立京东人民革命军和以玉田为中心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的决议。同时派省委组织部长于方舟同志带一批军事干部到玉田，加强对暴动的领导。

在于方舟同志的主持下，暴动队伍整编成京东人民革命军，杨春林同志任司令，刘自立同志任参谋长。革命军整编后，有三百多人，第一次打出“土地革命”的红旗，从遵化向玉田进军，沿途打土豪、夺取反动武装。在鲁家峪宿营时，由于缺乏经验，被数倍于我的地主武装包围。经过激烈战斗，我军伤亡、被俘数十人，于方舟、杨春林、解学海、刘自立等同志突围后，又与敌人遭遇，不幸被捕。在狱中，敌人对他们威逼利诱，施以种种酷刑，但他们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在一个严冬的深夜，都壮烈牺牲。

为时两个多月的玉田农民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是冀东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始武装夺取政权的先声，在冀东人民武装斗争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同时，它也为以后的斗争提供了经验和教训。玉田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在农民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党组织并未被敌人的血腥屠杀所吓倒，它们克服种种困难，继续坚持斗争，使自己逐步地得到恢复和发展。一九三〇年夏，举行了第二次武装暴动，在李立三盲动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这次暴动又遭到

了失败。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军炮轰我沈阳北大营，公然发动侵华战争。在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避免冲突”、“绝对不抵抗”的卖国政策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寇很快就占领了我东北三省。

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日寇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次年一月，攻占我山海关，三月，开始进攻冀东长城各口。当时驻扎在喜峰口的第二十九军，在地方义勇军的配合下，参加了对日作战，这就是“长城抗战”。但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抗战部队孤立无援，终于被迫撤退。接着，日寇很快就占领了长城沿线和热河及滦东地区，直接威胁我华北腹地。

为了制止日军继续入侵，把侵略者赶出中国，一九三三年秋天，冀东党组织在迁西县发动了农民武装抗日起义。这次起义也是为了配合中央苏区反对蒋介石第四次围剿的斗争。起义后，反动政府立即组织地主武装合力围剿、镇压，起义的农民终因经验不足，寡不敌众，被敌人打散，几十名同志被捕。

迁西暴动的失败，使党的工作又一次受到损失。但是，真正的革命者是不会被敌人的残酷镇压吓倒的。王平路、魏春波、韩东征等同志在白色恐怖下，仍然顽强坚持斗争，恢复并发展党的组织。

冀东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英勇斗争，前仆后继，是可歌可泣的。但是，在错误路线的影响下，各地的暴动都没有成功。这说明，要想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没有一条正确路线是不行的。

在中央苏区四次反围剿斗争胜利之后，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工农红军不得不开始战略转移，进行长征。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错误路线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领导，尔后才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挽

救了党和红军，从此，革命走上了正确轨道。

在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举行长征北上抗日，决心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政府却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卖国的“何梅协定”。汉奸殷汝耕在日寇的操纵下，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冀东沦陷在日寇铁蹄之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日寇把侵略中国的战火扩大到华北，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一战即溃，日寇很快占领了平、津及华北广大地区。这就更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抗日情绪日益高涨。

“七七”事变以后，党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派八路军挺进华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并具体提出建立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冀热边区抗日根据地，开展冀热边的游击战争。根据这个决定，八路军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先成立了以聂荣臻同志为司令员的晋察冀军区，随后于一九三八年又成立了以萧克同志为司令员的冀察热挺进军，开辟了平西抗日根据地。为了发动冀东游击战争，一九三七年秋，中共北方局派红军干部李润民、孔庆同二同志到冀东工作。那时，王平路同志已经组织了一支抗日游击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滦县举行了京东十县抗日人民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冀东人民武装抗日自卫会，发动冀东游击战争。会后，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首先建立了冀东抗日联军第一支队，王平路任司令员，史贞、李润民任正、副政委，孔庆同任支队长。这一年的十二月三十日，王平路同志在带队夜袭长城外的青河沿日本据点时，不幸壮烈牺牲。后来，这支队伍在魏春波同志的支持下，在彭夫、高存等同志的领导下，克服了困难，继续斗争，又增添了滦县来的新生力量张鹤鸣、张振宇等十八位同志，重整旗鼓，去兴隆县打下了药王庙等伪满警察据点。而后分散为

游击小组，打击汉奸、特务和捣毁日鲜浪人开设的赌局、白面儿（毒品）馆，收缴敌伪及地主武装。这些斗争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为以后的大暴动提供了经验，准备了一批军事干部和武器。

冀东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战争有三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一九三八年有二十万人参加的抗日大暴动。

一九三八年春，中共河北省委曾派人到北方局汇报并两次派人到平西和晋察冀军区与八路军联络，约定在八路军挺进冀东时，冀东举行起义，以迎接八路军东进抗日。

三八年六月八日，宋（时轮）、邓（华）支队从平西出发，挺进冀东。中共冀热边特委为了发动这次起义，在党作出决定之后，又和当时抗日同盟者国民党人洪麟阁、爱国民主人士杨十三等，在丰润县的田家湾子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会议通过党提出的成立抗日联军司令部和冀东抗日联军行动纲领，决定组织抗日联军六个总队，确定起义的日期为七月十六日。为了扩大暴动规模，争取尽可能多的同盟者，党派李楚离同志来冀东指导洪麟阁部，王仲华同志指导高志远部。

田家湾子军事会议以后，各部分头准备起义。这时，打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中的朱欣陶同志（在伪政府中担任警务科长）为我们提供了两条极为重要的情报：一是八路军宋、邓支队已于六月二十八日进入冀东平谷县靠山集一带；二是日寇马上就要收缴散布在冀东各县的二十三万支民枪。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配合宋、邓支队东进和赶在日寇收枪之前，轰轰烈烈的起义就提前于七月七日前后举行了。

冀东抗日联军原来打算成立六个总队，但起义后，抗日的工农群众如潮水般涌来，参加暴动的总共有二十多万人，编成了抗日联军三十九个总队和四个开滦矿区工人抗日救国总队，共有全副武装的战士十万余人，其中我党直接领导的有二十五个总队、四个大队、两个区队。当时暴动的范围，西起通县，东至山海关，

北起兴隆、青龙县，南至渤海湾，到处红旗招展，杀声震天。声势之大，威胁平津，震撼华北，惊动世界。冀东的敌人惶惶不可终日，不敢轻举妄动。在七月至十月的整个暴动期间，敌人一直龟缩在各个据点里面，死守待援。而工农为主体的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则到处积极进攻，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摧毁了敌人经营多年的反动统治基础，配合八路军攻克了七座县城、开滦矿和绝大部分村镇。并攻克了古冶洼里车站，使北宁路半月不能通车。

冀东大暴动震惊中外，是在我党领导下，在敌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的伟大壮举。它的特点有二：一是规模大，是全民性大起义，有几十万人参加；二是工农密切配合，开滦矿区的工人阶级与广大乡村农民密切配合行动。

党领导下的抗日联军主力第四总队和第五总队，首先在腰带山的岩口和滦县的港北起义。第四总队在遵化玉皇庙一仗歼灭了遵化县伪保安队，俘虏了八十多人；第五总队在滦县杨家院一仗，消灭了滦县伪保安队三百多人，并活捉了队长刘涛。这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加上八路军挺进冀东振奋人心的消息，大大鼓舞了抗日联军的士气，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胜利了，人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父送子、妻送夫参军的动人景象，群众踊跃献枪支、弹药支援部队的热烈情景，到处可见，光丰润县火石营一个村就出来五百人参军参战。

一九三八年八月，八路军和抗日联军在遵化铁厂会师，召开了铁厂会议。会议决定建立冀察热宁军区，统一指挥所有抗日部队，公推宋时轮、邓华二同志任军区正、副司令员，下设五个分区。但可惜这个决定未能实现。以后九间房会议决定八路军和抗日联军全部西撤整训，只留下包森、陈群、单德贵三个支队坚持冀东。抗日联军全部六、七万人，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向平西进发。由于部队是刚组织起来的，缺乏军事骨干，又未经过训练，在蔚县、密云、潮白河，连续遭到日寇和地主武装袭击时，队伍

大部分被打散了，只有一千多人到了平西，六千人返回冀东，整个部队损失了十分之九。

冀东抗日联军西进，受到了严重挫折，返回冀东后，又碰上日寇秋后大扫荡，又散了一部分。当时，部队士气低落，濒于瓦解。为此，抗联司令部在迁西县的柳沟峪召开了干部会议，分析了形势，重新作了部署，稳定了军心，并着手恢复地方工作。

一九三九年春，包森部队的几名战士以巧妙灵活的方式，在遵化北捉住日寇池本宪兵大佐，打击了侵略者的威风，鼓舞了冀东军民的士气。

一九三九年秋，冀东抗日联军三个团又开到平西整训，并正式改编为八路军第十三支队，李运昌同志任司令员，李楚离同志任政委，包森同志任副司令员，曾克林同志任参谋长，刘诚光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到一九四〇年，冀东的游击战又活跃起来了。这一年的一月，在遵化阁老湾召开了地委会议，参加者有李运昌、包森、刘诚光、周文彬、李子光、王少奇、丁振军等同志。会议决定冀东工作的重点是：巩固丰滦迁老根据地，开辟盘山、鲁家峪两个新根据地。在丰滦迁老区方面，由周文彬、刘诚光、丁振军、卢企明、江士林同志率五、九两个总队，以肃清土匪、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组织青年报国会和报国队等群众组织为主。在扩大新根据地方面，由包森、李子光同志率领二支队主力和蔚县游击队，开辟以盘山为中心的西部根据地；由李运昌、徐志、耿玉辉同志率七总队，开辟以鲁家峪为中心的丰玉遵中部根据地。从这时起，冀东地区的革命工作完全由我党统一领导，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东部和西部两大块根据地也很快连成了一片。

一九四〇年夏，到平西整训的十二团返回冀东，先在盘山与十三团配合打了几次胜仗，消灭了一批日伪军。而后由盘山返回东部，攻下丰润县老庄子和玉田县鴻鸿桥及赵各庄煤矿等十三个

据点。前后共打了二十多个胜仗，大大鼓舞了冀东人民的斗志。包森副司令员率领的第十三团有了很大的发展，他们在地方党组织的有力配合下，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肃清了盘山地区六百多名土匪，建立了比较巩固的根据地。随着军事上的胜利，根据地的扩大，成立了以焦若愚同志为专员的冀东专员公署，全区的地方政府也相继建立起来，并初步建立了财粮制度，克服了经济工作中的紊乱现象，保证了部队供给，壮大了我经济力量。不久，我军又一连打了几个大胜仗，开辟了平原大片新区，进一步鼓舞了冀东军民的斗志。这时，日寇声称要进行最大规模的扫荡，随后冀东军民展开了一场艰巨的反扫荡斗争。

日寇对冀东的大扫荡，是从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开始的。这次扫荡前，敌人耍了个花招：一面宣传要用最大的兵力来扫荡，一面只用小股武装与我周旋，造成一种虚张声势而并无实力的假象，借以迷惑、麻痹我军和人民。然而，却远距离集结重兵，形成大包围圈，搞所谓的“铁壁合围”。这次，日军出动两个旅团、六个联队，加上他们在冀东的守备队和伪军，号称“十万精兵扫荡冀东”。他们先从西、北、东三面山地向我压来，企图把我压缩到玉田、蓟县平原地带加以消灭。由于我军侦察工作做得不准确，所以没有及时识破敌人的阴谋，打了一场被动仗。

一九四一年六月一日，十三团在玉田杨家套、杨家板桥与敌人激战一天，第二天转到十棵树、六道街子继续激战。战斗结束后，第一营连夜转到盘山、平北及兴隆一带，另外两个营和教导队，被迫化整为零，分散转移出去，保存了实力，但损失了部分枪支。

十二团三个营加青英部队两千多人，在陈群团长的带领下，自六月二日起，在丰润、玉田连续同敌人打了几次恶仗。六月十二日，陈群同志在玉田孟四庄被炮弹击中，不幸牺牲。这位身经百战的长征干部到冀东以后，身先士卒，英勇作战，深受冀东军

民的拥护和爱戴。他的死是我军的重大损失。陈群团长牺牲以后，十二团又同敌人打了几次恶仗，有相当大的伤亡，智勇双全的第一营营长杨作霖同志也牺牲了。但部队斗志依然旺盛，在新任团长曾克林同志率领下，继续英勇地与敌人作战。

在这次大扫荡后，我们及时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等扫荡一过，在敌人洋洋得意，认为已经把冀东八路军统统消灭了的时候，我们则立即返回原地，集结部队，积极活动，迅速恢复地方工作。

一九四一年夏，冀东党委举行了大张屯会议，决定用全力开辟热河山区根据地，以扩大部队回旋区，同时，加强老根据地内部的锄奸防特工作。会后，先派高敬之、周治国等同志带武装工作队到口外伪满敌占区探路，而后派遣十二团和十三团深入热河山区，以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并带去热河人民所急需的生活日用品（火柴、剪刀、布匹、食盐等），发给当地人民。部队吃老百姓粮食后开条，随后就由地方政权按条付现款，以建立政权威信。这样，很快取得了热河人民的信任和拥护。为了不惊动敌人，暂时不打据点，对伪军、伪组织则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共同抗日”为口号，争取他们和他们的家属，使他们不向日军报告我军消息。与此同时，进行铲除汉奸的工作。这样做，使我军在热河的工作进展极为迅速，很快就开辟出从都山到雾灵山之间的广阔的游击区。

就在我们调兵遣将全力开辟热河时，伪治安军二十三个团共三万多人开进冀东。他们企图先以团营、后以连排为单位，分散驻守在我冀东根据地内，妄想把我们的根据地吃掉。这就是敌人吹嘘的“三次强化治安”运动。为了蛊惑人心，与我争夺地主阶级上层人物，他们还胡说什么“治安军是中国人的军队”，散布“曲线救国”论，使一些接近我们的地主上层人物开始动摇，一部分基本群众也迷惑不解。针对这种情况，冀东军区负责同志李运